

论新时代教育公平的社会心态支持

杨 跃

〔摘要〕 在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需要的完整、和谐的社会支持系统中,广大民众的社会心态支持不可或缺;推进新时代教育公平,亦离不开优良的教育公平心态,即民众在有关教育公平的价值观、认知、情绪、行为倾向等方面,能够秉持科学理性的价值观、积极平和的情绪情感,对国家为推进教育公平而制定、执行政策充满信任,对我国教育事业公平发展与质量提升葆有信心。建设优良的教育公平心态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需要舆论正确导向、赋权公众参与、尊重多元选择,从而凝聚广大民众对教育及教育公平议题的正确的价值共识,提升广大民众对国家教育事业公平发展的社会信任,重建良好心态秩序。

〔关键词〕 新时代教育公平;社会心态支持;价值共识;社会信任;心态秩序

21 世纪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在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在“人人有学上”“确保起点公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面临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要和资源配置、社会承认、文化关怀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2022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将“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作为工作重点;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部署,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再次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及“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是新时代的重大战略任务,“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等是重要战略举措。新时代教育公平在强调“质的提高”“人民中心”“共同富裕”等方面展现出新的内涵和特征^①,推进和实现新时代高质量教育公平需要“完善以共治为要领”^②、协同高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其中,除来自政府的财政投入、政策、制度等的支持之外,来自舆论导向、文化观念等的公众支持亦不可或缺,而公众的社会心态支持更是至关重要。当前,凝聚正确的教育公平价值共识、建设优良的教育公平社会心态,为实现新时代教育公平目标提供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杨跃,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7)。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新时代教育公平的国家战略、推进策略与社会支持研究”(VGA220002)的研究成果。

①陈南、程天君:《以“高质量教育公平”国家战略回应时代挑战》,《人民教育》2023 年第 3、4 期。

②陈南、程天君:《以“高质量教育公平”国家战略回应时代挑战》。

一、社会支持:教育改革与公平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社会支持即社会网络运用物质和精神手段(包括资源、信息、知识、情感、精神、文化等)对特定社会组织、群体或行动提供各种直接或间接帮助的行为;社会支持系统则是由若干社会支持要素以一定联接方式构成的具有社会支持功能的有机整体^①。随着社会支持理论在教育研究中的不断拓展和深入,近十年来,围绕各级各类教育改革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支持,学界取得了创新性研究成果;已有研究或是在整体意义上分析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社会支持,或是聚焦于社会支持中的政策支持和公众支持,但相比于有关社会支持体系和政策支持的研究成果,关于公众支持及其中更加具有多样性、潜在性等特殊性的民众社会心态对教育改革与公平发展的双向作用等的研究,则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一) 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系统的社会支持

近十多年来,教育学者们强调指出,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思想理念、组织机构、制度规则等多类型、多领域、多方面的社会支持发挥保障、促进作用。例如,肖昊将教育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区分为社会资源性支持和社会环境性支持,提出教育发展要坚持“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统一”“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等基本原则,并创建教育改革的社会共商机制、教育发展的社会共谋机制、教育质量的社会共保机制和教育发展成就的社会共享机制等长效运行机制^②。吴康宁强调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完整、谐和、适度以及大致均衡的社会支持^③。王海英分析了教育改革社会支持系统协调运行所需要的组织机构、制度规则、平台建制等^④。

除上述宏观层面的理论阐述外,还有学者明确聚焦诸如基础教育、高考选拔评价、职业教育、教师教育等特定教育领域并基于该领域的特殊性,具体分析了特定教育领域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设策略。例如,汪明主张基于核心素养的基础教育改革应从教师队伍建设和课程与教学改革、学校文化重塑、家校合作优化等关键领域入手进行顶层设计,并积极争取舆论和来自高校智库的智力支持^⑤。娄立志等根据社会大众作为相关利益者对高考改革的不同态度,着重分析了新高考改革的支持、反对、中立等不同力量间的碰撞与较量,强调社会支持的作用体现在高考改革的不同阶段^⑥。赵学瑶等主张构建职业教育发展支持体系,形成政府、企业、职业院校“三位一体”的功能系统^⑦。教师教育研究者则关注到政策、舆论、文化浸润引导和资源共享、实践互动等多主体联动^⑧以及高校和中小学校共同形成教师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力量^⑨。

上述宏观层面的理念、制度分析以及针对特定教育领域的具体阐释,都着重于在“社会支持系统”的整体意义上分析和阐释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支持及其实现,强调社会支持系统是由若干社会支持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应以促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为目的,对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重要的社会支持功能;包括政府和教育界自身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应对凝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社会

①肖昊:《教育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几个理论问题》,《当代经济》2012年第4期。

②肖昊:《教育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几个理论问题》。

③吴康宁:《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怎样的社会支持》,《教育研究与实验》2013年第6期。

④王海英:《试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条件保障》,《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8期。

⑤汪明:《基于核心素养的基础教育改革:顶层设计与社会支持》,《教育科学研究》2017年第7期。

⑥娄立志、张基惠、刘淑媛:《新高考改革的社会逻辑初探》,《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20期。

⑦赵学瑶、卢双盈:《对建构我国职业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理性思考》,《职教论坛》2015年第10期。

⑧付光槐:《论教师教育改革社会支持机制的构建》,《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16期。

⑨杨跃:《论教师教育改革的院校支持系统》,《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支持系统尽职尽责。

（二）教育公平发展的政策支持被寄予厚望

任何一项致力于推动教育发展的改革行动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教育自身的努力,而且离不开包括政府、公众、市场、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各类组织、群体及个体力量的有力支持,特别是政府对于“形成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系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①;政策对于促进国家教育公平发展的支持、保障作用更是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

有学者指出,2012年开始实施的招生专项计划通过自上而下政策设计的形式为农村贫困学生创造了更多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但该项计划还无法惠及大部分农村学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公平问题^②;还有研究总结了“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和“全国高校网络培训与教育工程”等四项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重大工程在促进教育公平中的创新实践经验及其发挥的政策支持作用^③。此外,有关乡村小规模学校、外来工子女教育、中西部高等教育、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等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弱势群体受教育权保护等研究,亦均阐释了政策在推动教育公平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支持作用。针对新时代社会发展对教育公平提出的更高要求,有学者强调“有质量的教育公平”需要“充实和完善政策工具箱”,从而“精准解决教育公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④

这些研究不仅聚焦于教育政策自身而且“跳出教育看教育”、关注到社会政策体系对于教育公平的影响,而且强调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需要完善包括教育政策在内的社会政策,进一步明晰政府责任、公民权利和不同教育领域的特殊属性,以及政府、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关系等,更加突出强化政府职能与责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力量以及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步推进社会政策领域的综合改革;为克服各项教育政策之间存在的“失衡”“失协”“失当”的情形,积极建构“上下衔接、内外配套、左右协调”^⑤的系统、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并细化政策“落地”的执行方案,优化教育公平发展的政策支持环境。

（三）民众社会心态等公众支持亦不可或缺

除政策支持外,在教育改革与教育公平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中,公众支持也是不容小觑的重要力量;然而,相比于政策支持研究与日俱增的丰硕成果,一方面,迄今为止有关社会舆论^⑥、社会组织^⑦、“公众与社会群体”^⑧、社会心态^⑨等公众支持的研究相对较为有限,有待进一步丰富;另一方面,相比于政策的公开性、明确性等特点,影响教育改革与公平发展的公众力量特别是其中的民众心态则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影响作用更为潜隐,教育改革与公平发展要谋求广大民众的社会心态支持因而更加艰辛不易。

①吴康宁:《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怎样的社会支持》。

②申书炜:《新政策设计支持下的教育机会公平研究》,《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8期。

③陈丽雯、陈耀华、陈琳:《以现代远程教育提升教育公平的政策支持和实践》,《现代教育技术》2018年第11期。

④褚宏启:《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公平:研究问题域与政策工具箱》,《教育研究》2020年第2期。

⑤程天君:《衔接·配套·协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支持之要领》,《教育学报》2014年第4期。

⑥韩鹤进:《我国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研究》,《中国成人教育》2015年第15期。

⑦参见黄忠敬、方小娟:《社会组织在促进教育公平中的作用》,《外国中小学教育》2016年第10期。杜明峰、范国睿:《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机制与策略》,《教育研究》2017年第2期。杜明峰:《转型期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逻辑、实践与优化策略》,《教育发展研究》2021年第10期。

⑧有研究者在我国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研究中将“业内专业人士”“家庭”“社会舆论”“公众文化”四项要素概括为“公众与社会群体”。参见吴康宁等:《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⑨祁志伟、雷霆:《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政策及其社会心态影响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4期。

“心态”是“影响着个人、人类群体和各民族思想的全部舆论、习俗、传统、信仰和价值体系”^①；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整个社会或社会大多数成员共有的宏观的社会心理状态”^②，也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③。作为大众心理的“风向标”，社会心态反映出社会转型、变迁中社会群体在价值取向、认知、需求、情绪、行为意向等各方面的变化；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在全体民众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民众的教育公平心态指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整个社会或社会大多数成员对教育公平所共有的心理状态，是民众对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认知、需求、情绪、行为意向等的总和；民众对于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公平性等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心态广泛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与特定社会的教育公平现实状况相联系，并且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当前，我国在有关教育公平主题的研究中，民众社会心态对相关教育公平政策的实施过程、执行效果、目标达成等的影响以及所能够发挥的支持作用等，虽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但仍需通过深入研究有关大众社会心态对教育改革与公平发展的支持、保障及推动作用，进而推动教育公平理论、政策及实践取得新的突破。

二、社会心态：实现教育公平目标的重要支持力量

当前，在推进和实现新时代教育公平的进程中，需要在正确的教育公平价值共识导引下形成优良的教育公平心态，为实现高质量教育公平目标提供更加广泛的有力支持。

（一）推进教育公平需要凝聚民众的价值共识

公平正义是人类共同理想追求；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对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促进高质量教育公平是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任务，也是广大民众对教育发展的热情期待。有研究者在梳理我国超常教育正式开展40年来的政策和实践时分析发现，我国“早期的超常教育发展得到国家和政策的大力支持，但并没有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对超常教育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阻碍”^④；可见，如果没有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和坚实的价值共识基础，要达成教育公平政策目标并非易事。作为不同社群普遍具有的基本一致的认识或曰社会成员的集体性认识，“共识”“在本质上是一种自证自知的事，并不以签署文书或者发表声明为前提或目标”^⑤；然而，“教育公平”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人们对教育公平政策原则亦仁智互见。

例如，关于“教育公平”的概念内涵，教育学术界虽已有基本共识（如普遍认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公平”表示利益分配中所得利益是具有道德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应得”，“教育公平”作为教育利益分配的价值判断，是“一个反映相对性的范畴”、“不是反映绝对性或确定性的范畴”，“绝非是绝对平等”^⑥）；但对于新时代教育公平的新意涵、新特点等则依然存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教育公平是指“受教育权利与教育资源分配的合理性、正当性，以及教育活动

① 汝信：《社会科学新辞典》，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022页。

② 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

③ 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④ 程黎、马晓晨、张凯等：《我国超常教育发展40年：基于政策及实践的分析与展望》，《中国特殊教育》2018年第8期。

⑤ 叶飞霞：《凝聚改革共识的难点分析与路径探究》，《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⑥ 郭元祥：《对教育公平问题的理论思考》，《教育研究》2000年第3期。

的目的、内容、程序与功能等对人的发展产生影响的一种合理性状态与水平”,在新时代,“我国教育公平是指社会成员能够自由而平等地享有每一个层级的公共教育资源”^①;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公平的理念应该超越单纯强调均等或平等的朴素正义观,而走向一种差别对待的正义观,提倡对相同者可采取均等的对待,而对于不相同者则可采取差异化对待^②。又如,关于教育公平政策应秉持何种原则,学术界提出了“平等原则”“能力原则”“差异原则”“补偿原则”等各种观点,但也有学者认为“平等原则”和“能力原则”“这两种命名都不正确”,不仅“平等”而且“自由”也是教育公平制度最为根本的制度伦理,在普惠性利益分配中应遵循对弱势群体平等关切的平等原则,而在竞争性利益分配中则应遵循基于能力自由竞争的差异原则^③,强调推进新时代教育公平应将教育的“差异性公平”作为新重点,将“英才教育”作为新增点^④。

学术界对于“教育公平”意涵的理解和阐释尚且存在认识分歧,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市场、公众乃至专业组织、非政府机构等不同主体,更会因价值观念、利益立场、生存境遇等的不同,而对教育公平产生不同的主观认识、心理感知;特别是广大民众的教育公平观和教育公平感常常存在差异甚至相互冲突。不同家庭和学生对教育发展的需求、对教育公平的诉求,在阶层、文化等特定群体的共性基础上也都存在着明显的个性化差异,这使得正确的教育观、成才观、教育公平观等价值观念的凝聚和文化共识的达成,事实上都极其不易。

例如,我国 21 世纪以来,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执行的“重点学校”制度所造成的基础教育学校发展不均衡这一教育现实,为了缓解因优质教育资源稀缺而导致的愈演愈烈的“择校”和日益加重的儿童青少年学业负担问题,2002 年 12 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教基[2002]26 号)提出“积极探索建立招生名额分配、优秀学生公开推荐等制度”,首次在国家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制度”(又称“指标到校”政策);其后,我国各省市地区陆续在当地普通高中招生中开始执行这一政策举措,将本地优质普通高中招生名额“定额分配”到区域内的各初中学校。然而,这项旨在保障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公平、促进区域内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缓解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的政策,却因为社会各界的“教育公平观”不同,引发了复杂的社会心态,政策在实施中也始终存在争议,不同社会人群对诸如“同分不同命”现象背后的政策公平性问题也始终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些地区甚至暂停执行。该项政策关涉到区域(市辖范围内的各区县)、校际(初中学校与高中学校,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薄弱学校)、生际(在不同学校就读的学业成就水平相同或不同的学生)等多重群体之间的资源分配公平问题,围绕该项政策实施中诸如“最科学的指标到校比例应该是多少?”“下延分数线在什么范围才合理?”等核心问题所引发的争议和分歧,都与民众对教育公平的认知和理解直接关联;也明显反映出民众对教育公平的认知和体验是影响政策成效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推进新时代教育公平发展及相关政策实施、改进中,需要关注和重视民众对于教育公平的不同价值观念及其形成原因、影响因素等,并且致力于促进广大民众对于新时代教育公平的发展目标、政策原则等形成正确认识,致力于凝聚正确的价值共识。

(二) 形成正确价值共识离不开优良社会心态

作为社会成员的集体性认识和群体性情绪,“共识”包括社会的价值观念及共同的利益追求(但

①单文周、李忠:《新时代教育公平内涵与建设的思考》,《教学与管理》2019 年第 36 期。

②胡劲松:《论教育公平的内在规定性及其特征》,《教育研究》2001 年第 8 期。

③褚宏启:《教育公平的原则重构与制度重组——兼论什么样的教育不平等是公平的》,《教育学报》2020 年第 5 期。

④褚宏启:《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公平:研究问题域与政策工具箱》。

“也并不要求各方无条件地抛弃自己的利益诉求”^①),与社会心态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②。作为社会心态组成部分的教育心态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主体在认识和反思教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动态发展的群体心理态势,主要包括教育认知、教育需求、教育情绪与情感、教育价值取向和教育行为意向,是对教育问题、教育现状最真实、最本质的反映^③。教育公平心态则是弥漫在整个社会或特定人群中的对于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与认知、情绪情感与行为意向等心理态势,包括教育公平认知(即对教育公平的认知和理解,如对教育公平政策的认知和信任)、教育公平情绪(即对教育公平政策或现象的情绪情感反应,如教育公平感、对教育公平政策执行的满意度等)、教育公平价值观(即对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以及教育公平行为意向(即教育选择、教育期望等行为中的公平倾向和意图等)。

社会心态的最本质特征“即涂尔干所说的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所具有的突生性”。“突生性是指包括社会心态在内的社会事实确实源自个人事实或个体心理,但它并不是个人意识或心理的简单之和,它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即涂尔干所指出的“集体心态并不等于个人的心态,它有其固有的规律”^④;亦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群体心理特点时所发现的,群体心理正是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影响着个体的思想和心理,并且使得个体将这种“集体无意识”视为自己的观念和态度。作为一种隐性和难以直接确认的社会心理倾向,社会心态一旦形成就成为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直接影响人的观念、行为及社会实践与生活,并且因具有普遍性、大众性、广泛性、弥散性、稳定性、延续性、抗变性和相对独立性等特点而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改变,进而会对社会整体精神风貌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会削弱制度变革等有目的政策行动的成效。

同样,教育公平心态作为“突生”的“社会事实”,在民众有关教育公平理念、制度、政策等认知、体验及行为倾向的形成中,亦表现出促进与消解的双向功能。与新时代教育公平内涵及价值取向等和谐一致的优良教育公平心态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对凝聚正确的教育公平价值共识发挥着潜隐却巨大的影响,助力国家相关教育公平政策的实施及其政策目标的达成;相反,与新时代教育公平内涵及价值取向等不尽协调甚至相互冲突的不良教育公平心态则有可能因民众难以改变在公平认知等方面的固有思想与固化行为或者对新时代孕育的公平理念等抱有抵触情绪而对相关教育公平政策的实施及其目标达成产生消极、阻碍作用。

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1984年间堪称“载入中国历史史册的黄金时期”,“全民满怀希望”的社会心态源于当时社会变迁引发的“帕累托改进”,即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都得到增进而无受损;1984年后随着社会变迁趋于复杂,社会心态也开始发生转变^⑤,包括教育在内的我国各个领域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结构性变迁之中,受社会结构全景式分化与流动的影响,各阶层民众在社会心态上也随之发生演变与波动,呈现出选择性、多元性、差异性等发展特点^⑥。当前,我国民众的社会心态在总体上是健康、积极的,但受社会现实问题的影响,亦存在冷漠、焦虑、不信任等不良社会心态,不利于凝聚正确的价值共识、释放社会活力;特别是广大民众因对子女的教育、成长普遍充

①叶飞霞:《凝聚改革共识的难点分析与路径探究》,《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②叶飞霞:《改革共识建构的社会心态基础分析》,《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③庞瑜、马岳勇:《改革开放40年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心态的变迁》,《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④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

⑤胡凯基:《帕累托改进带来的全民希望——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心态浅析》,《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⑥严飞:《分化与流动:我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心态变迁(1978—2020)》,《求索》2021年第6期。

满焦虑进而对教育公平政策产生认知偏见、情绪障碍、不信任心理等,这种不良的教育公平心态又使得教育公平政策执行遭遇阻力(如固守“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教育公平观对“指标到校”政策执行的影响等)。过度焦虑等不良教育心态对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和个性、人格完满发展所造成的伤害更是令人极为痛心。

以当前“双减”这项重大民生工程的推进工作为例。自从2021年7月旨在重塑良好教育生态、推动育人目标回归教育本质的“双减”政策颁布、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对校外培训机构全面规范、校外学科类培训市场大幅收缩,但校外学科类培训又开始以各种隐形变异样态出现,表现出隐蔽性、多变性等特点,暗中“顶风作案”的违规培训也逐渐猖獗;为营造打击违规培训的高压态势、持续强化校外培训监管,教育部在“双减”政策颁布一周年之际,于2022年7月20日至8月30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以“强化培训监管 守护快乐假期”为主题的校外培训“监管护苗”暑期专项行动,坚决打击以“一对一”“高端家政”“众筹私教”“研学旅行”等名义违规开展培训以及学科类培训机构“假注销、真运营”等情形。然而,由于民众长期受“学而优则仕”实用主义信仰及“一考定终身”考试制度的影响,“教育观念仍未转变”,使得“双减”政策在执行中仍然出现了短期主义、功利主义、本位主义等问题^①。这些问题的出现即源于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教育和社会竞争加剧的现实中,不断滋长、逐渐蔓延、持续弥散的民众教育焦虑,而这一长期积累并不断膨胀、广泛扩散的社会心态又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扭转。“双减”政策旨在巩固和推进教育公平,确保国家义务教育的公益属性和公共性,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即为全体适龄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可持续、全面发展奠定基础);然而,广大民众出于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不惜投入大量家庭资本,并且在“迫不得已的攀比”中进一步加剧着社会焦虑心态的弥散性。一项实证研究发现,不同阶层的城市家庭对“双减”政策的认识和理解以及执行态度、行为参与等,均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具有较强的阶层同质性,又因家长的学历、职业等因素而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呈现出多元化的教育实践和策略景象”(例如,与中产家庭不同,工人和个体劳动者家庭更明显地表现出对“双减”政策成效的怀疑与不信任、担忧该政策对子女的学业成就和升学表现会造成不利影响);不仅“升学导向的教育考评制度未能缓解家庭教育焦虑”,甚至“初衷良好且目标明确的‘双减’政策在取得一定减负成效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教育公平风险”。^②

又如,自20世纪80年代国家积极发展职业教育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家又大力推进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不断颁布和完善职业教育相关政策、规章制度,努力创造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我国高职教育也由此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正如一项对高等职业教育相关群体社会心态的调查研究所发现的,社会大众对高职教育普遍持消极冷淡心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高职教育发展遭遇民众心理阻力,导致了高职院校招生难、教育质量低、受人歧视等问题^③。应该说,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始终面临一个严峻挑战,即广大民众对职业技术教育普遍持有消极心态(即便人们了解并认同“高级蓝领人才稀缺”这一国情事实)。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和扶持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之所以同样陷入了“招生难—质量低—遭歧视”等恶性循环,在相当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社会民众所持有的人才观等教育文化传统观念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现实相互交织而催生的普遍阻抗性社会心态,广大民众尚未对职业技术教育及高水平职业

①杨燕:《“双减”政策执行的阶段性特点及问题分析——基于对X省四组关键利益相关群体的调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②刘倩、程天君:《“双减”政策施行的结构困境及其纾解——基于城市家庭参与教育改革的案例分析》,《中国远程教育》2023年第9期。

③彭慧:《高等职业教育相关群体的社会心态研究——基于社会心理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5年,第1页。

技术人才形成正确的理性认知与价值认同仍是我国职业技术教育高质量发展最具“杀伤力”的制约因素。

综上所述,无论是顺利推进“双减”政策,还是大力促进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全面、深入地推进新时代教育公平都离不开社会各界尤其广大民众真正树立“立德树人”“全面发展”“适合的教育”等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念,而凝聚民众的正确的教育价值共识又和全社会拥有优良的教育及教育公平心态有着密切关联。所谓“优良的教育公平心态”即民众在有关教育公平的价值观、认知、情绪情感、行为倾向等各方面,能够秉持科学理性的价值观念与认知、积极平和的情绪情感与行为倾向,能够对教育公平的政策执行充满信任,对我国教育事业公平发展与质量提升葆有信心(如相信各级政府能够严格地持续执行“双减”政策,对政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技术教育”充满信心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凝聚正确的价值共识。这是保障新时代教育公平政策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效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支持力量。

三、优良社会心态建设:助力新时代教育公平之举

由于教育公平问题极为复杂,当前我国教育公平政策在实施、推进中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认识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诉求也会不同”,“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强调“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要“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①实现新时代高质量教育公平的政策目标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虽然拥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但社会支持体系欲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更大功效,离不开优良社会心态的支持。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广泛存在于整个社会和各类社会群体中的且与特定社会运行状况或与重大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宏观的、动态的、突生的社会心理态势^②,体现了特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时期中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和追求,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价值观、社会需求与认知、情绪情感与行为意向等构成,对政府公权力等的社会信任一般被包含在社会认知中。民众对教育公平政策及其目标实现的社会心态支持亦即民众在对教育公平及其政策目标等的认知、情绪、行为倾向等方面形成了优良的社会心态,具体表现为拥有正确的教育公平价值观,对国家教育公平政策有科学合理的认知、理智平和的情绪、对政府公正执行相关教育公平政策充满信任、对教育公平发展充满信心等。建设优良教育公平心态、推进新时代教育公平目标实现,既需要舆论正确导向、凝聚价值共识,也需要赋权公众参与、促进社会信任,更需要尊重多元选择、鼓励百家争鸣、重建心态秩序。

(一) 舆论正确导向、凝聚价值共识

虽然很难对“共识”做出精确的定义,但作为群体性认识的“共识”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极为密切^③;民众对教育公平的价值共识与其教育公平心态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社会舆论在

^①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第2版。

^②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③叶飞霞:《凝聚改革共识的难点分析与路径探究》。

影响民众的价值选择、政策认同、公权力信任以及型塑社会文化心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在新时代教育公平政策实践中，为了促进政府、社群、民众等能够对新时代教育公平理念、教育公平政策原则与目标等达成正确的价值共识，各类大众传媒应该积极发挥舆论的正确导向和正面引导作用，帮助民众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家教育公平政策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科学性、合理性等，提高民众对教育公平政策的认同与信任。

舆论需积极宣传正确的成才观、教育观。长期以来，“唯分数”“唯升学”“一考定终身”等错误或片面的教育价值观对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生了广泛、沉重的负面影响，包括主流媒体和各类自媒体在内的大众传媒都应着力宣传正确的教育理念，以及学校教育在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开发学生学习潜力、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帮助家长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形成理性认知、纠正错误的教育价值观，淡化“考高分”“上名校”“找好工作”“改变社会地位”“光宗耀祖”等功利性教育价值观，促进民众坚定正确的教育信念。在为学校教育提质增效而积极构建的“多主体协同、全领域治理”^①体系中，除政府、学校、家庭、社会教育机构外，包括各类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均有“为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优良环境”的义务，亦应积极传播“以学生核心素养培育为导向”“促进学生终身可持续全面发展”“培养幸福的普通人”等正确的教育观、成才观，为缓解全民教育焦虑、创建良好教育生态，尽传媒行业应尽之责。同样，对英才儿童施行特殊的英才教育也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纠正认识误区，敢于在政策上予以突破，甚至对英才教育立法，而且需要包括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广大民众自觉地将包括英才儿童在内的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成长需要看作教育的出发点和目标，都能够将“适合的教育”作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基本理念。

舆论需及时帮助民众澄清认识上的误区。大众传媒的主要功能不仅在于为公众提供正确观念和信息，而且可以通过及时提供准确信息而澄清公众可能产生的错误认识，帮助公众对于其关心的生活事件形成正确的认识。我国社会民众由于对教育公平有着极大的诉求和关注度，如果未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和理解国家有关教育公平的政策目标及其执行规则等，则很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这时就亟需大众传媒发挥及时传播准确信息的作用。例如，2016年教育部和国家发改委在发布的《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方案》附件《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调控方案》中首次公布包括江苏在内的12个省市将面向中西部10个省区调配16万招生名额，其中，江苏省的调配计划为3.8万，在12省市中位居第二。由于民众未能全面、准确地获知该项政策的相关信息而出现了令人紧张的舆情，幸而有关部门及时澄清了真实情况，舆情在民众获知“在生源计划输出省办学的所有高校在当地的录取比例不降低”等极为关切的信息后迅速趋于平稳^②。又如，我国学者提出在教育公平“升级换代”中应该关注“差异性公平”并“精准提供差异性教育服务”从而“满足因为群体差异、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同教育需求”^③，但事实上，由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如“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根深蒂固、社会制度建设又大多秉持普遍主义取向，我国广大民众在理解“差异性公平”这一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教育公平价值理念上存在认识误区，会直接影响相关公平政策的推进和制度建设的成效。为此，需要舆论及时帮助民众澄清误识、转变观念，促进正确价值共识的形成。

（二）赋权公众参与、促进社会信任

在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中，包括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在内的社会信任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研究主题；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是社会心态的一个组成部分，通常被纳入“社会认知”的范畴，但

①李芳：《“双减”政策下学校教育提质增效的问题与突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②郑石明、鄒智：《迈向有质量的公平：中国教育公平政策变迁与转型逻辑》，《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年第5期。

③褚宏启：《教育公平的原则重构与制度重组——兼论什么样的教育不平等是公平的》。

“信任”“信心”又常常表现为一种情感和行为倾向特征。党和政府公信力又是社会信任的内核,社会心态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之间具有稳健的双向关系。如果党和政府面临公信力危机或者不能及时缓解社会信任不足引发的问题,那么,公众与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有关的相对剥夺感、怀疑、怨恨等负性情绪,以及集体主义、诚信、友善等积极价值观的减弱、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增强等消极社会心态^①,便会在更大范围内扩散和弥漫,甚至诱发冲突、威胁社会信任。社会心态是特定社会现实在人们脑中产生的心理反映,但“未必是直接的映射,可能会存在‘折射’”,即“人们如何认知和想象社会现实比现实本身更直接地决定了社会心态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社会想象方式的不断嬗变,带来了纷繁芜杂的社会心态表现”,“重塑社会想象方式是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关键切入点”^②。赋予广大民众参与对教育公平政策制定、执行等的监督、评价,激发其参与的热情、提高其参与的能力,有助于调谐民众的社会认知、提升民众的社会信任,促进优良社会心态的构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教育领域突出体现为教育发展的公平性和高质量程度均需进一步提升。为了更好地解决教育发展不充分的现实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任务;而推进高质量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则更进一步着力于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紧迫问题。然而,如前所述,“教育公平”是一个内涵复杂的历史概念,虽然人们对“教育公平”的向往和追求是永恒的(因此,致力于实现教育公平的改革行动毫无疑问具有道德合法性),但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中,不仅政府致力于解决的教育不公平(或者欠公平)问题以及相应的战略重点不尽相同,而且人们对何谓“公平”“教育公平”以及教育政策、原则的公平性判定标准等又始终仁智互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将教育公平作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取得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现“起点公平”等“穷国办大教育”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但是,曾经因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现实国情所限而采取的“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等教育发展指导思想,也造成了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重点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路径依赖”,导致在民众不满足于“有学上”而希望“上好学”的新时代,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高质量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新的支持。

如果说,“新时代”以前,民众对教育公平的诉求主要是“机会公平”和“起点公平”,教育改革与发展虽然在整体意义上可谓“做大蛋糕”,但依然有可能会带来部分人群(个体、家庭)的某些局部利益的减损,因此,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遭遇的最主要难题是,如何面对这部分民众群体基于自身局部利益减损所产生的改革阻抗,并且增进这部分民众群体对教育改革的支持;那么,在如何更加公平地“分(大)蛋糕”的“新时代”,关于教育公平的优良社会心态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难题则是民众在对“公平”“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的认识和理解上,会秉持不同的公平观念、产生不同的公平体验、生发不同的追求公平的行为,进而对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公平发展及相关政策实施产生消极影响。此外,在新时代,民众对高质量教育公平的理解和追求已经转变为“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而要在“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内涵、表征、指标等方面达成基本而且正确的价值共识并非易事;更重要的是,如果说“社会认可”是“评价教育改革效果绕不过的标准”^③,那么,民众对“教育公平”理解的多元性则使得新时代旨在追求高质量教育公平的任何一项改革行动或政策措施在赢得社会认可、具备社会合法性方面都有可能面临巨大挑战。

①辛自强:《社会想象的三大维度及嬗变》,《人民论坛》2019年第29期。

②辛自强:《社会想象的三大维度及嬗变》。

③吴康宁等:《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第6页。

因此,推动公众参与对教育公平政策制定、实施的监督、评价,赋予公众一定的监督评价权、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提高公众的参与能力,培育和提升各方利益相关者对新时代高质量教育公平的价值共识、促进社会信任,保障新时代教育公平政策取得预期成效,不断增强民众的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是对新时代教育公平的重要支持。

(三) 尊重多元选择、重建心态秩序

凝聚正确的教育公平价值共识、增进民众对教育公平政策的社会信任,并不意味着只允许一种认识甚至实现绝对的思想统一。费孝通先生曾多次强调,“如果人们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这种心态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看法,就会形成我所说的多元一体,一个认同的秩序”;所以,阎云翔在阐述费孝通先生的这一思想时提醒我们,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心态秩序”“绝不是说我们要有共同的心理构成,我们对所有事情的看法都要一样”,“他反复强调心态秩序背后隐含的是,对于如何能够在保持价值多元的情况下,建构一个秩序井然、运作顺畅的社会的深刻思考”,“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学会容纳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才是心态秩序建立的关键”^①。因此,在教育公平政策执行和教育公平优良社会心态建设中,为了推进价值共识、增进社会信任,亦需引导民众积极参与教育公平政策等公共议题的讨论,鼓励百家争鸣、平等沟通;这既有益于提高民众对政策理念的认同度和对政策执行的信任度,也有助于民众在交流碰撞中形成自己的认识、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形成底线式价值共识。否则,运动式治理方式常常会激化民众的心理逆反进而削弱政策成效。在这个意义上,建设新时代高质量教育公平的社会心态支持可谓“教育改革‘深水区’中的‘最深处’”。

虽然社会心态形成后会具有一定的抗变性和相对的独立性,人们总是倾向于按照既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定式去思维和活动,与社会形态的更替相比,社会心态的转变比较缓慢;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心态是一成不变的,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大众社会心态即呈现出多变化、多维度等特点。当前,受信息传媒普及化、信息获取便捷化、信息传播迅速化以及充满易变性、模糊性、复杂性等特点的“乌卡时代”的到来,我国民众在心态秩序上亦面临着巨大的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衡状态。有学者指出,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民众对政府提供优质基础教育的满意度也比较高,但同时人们的教育机会不公平感则普遍增强了,而且优势阶层的不公平感更强,不公平感的增速也更大,焦虑感也愈发强烈;强调“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不仅要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使各类型高等教育都能分类特色发展,达到生态共存;还要关注人们的教育心态,引导人们调整不适应普及化高等教育生态的教育心态,充分利用普及化阶段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教育,活出自己的出彩人生,达到心态共荣。”^②

当然,为促进新时代教育公平目标实现,在鼓励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形成正向支持、增强民众信心时,也需要规避“制造舆论”的做法,“要清楚地认识到宣传不能脱离事实而存在,对真实的宣传不能加以修饰”,“不仅要宣传已有成绩、宣传可能前景来引导公众信心的建立,还不能回避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以及遇到的困难,引导公众建言献策”^③。

总之,推进新时代教育公平目标实现,需要将教育公平放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中优先谋划,全面调查、深入分析、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不同民众群体的教育公平心态(即民众对教育公平的价值认同、文化认知、情绪体验、行为倾向),发挥舆论正确导向、赋权公众参与、尊重多元选择在建设教育公平

^① 阎云翔:《多元化:心态秩序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

^② 余秀兰:《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的民众教育心态》,《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第11期。

^③ 韩鹤进:《我国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研究》,《中国成人教育》2015年第15期。

优良社会心态中的积极作用,凝聚广大民众对教育及教育公平议题的正确的价值共识,增进广大民众对党和政府各项教育公平政策执行的社会信任,确保不同民众群体能够充分地共建共享、重建良好心态秩序,推进新时代高质量教育公平目标实现。

(责任编辑:蒋永华)

On Social Mentality Support for Education Fairness in the New Era

YANG Yue

Abstract: In the complete and harmonious social support system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ocial mentality support is indispensable. To promote educational fairness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positive social mentality support for education fairness. It means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can uphold the values of scientific rationality with positive and peaceful emotions, and be full of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al fairness policies, in terms of cognition, emotion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towards educational fairness. Currently, constructing a positive mindset towards educational equity is an important and urgent task. It requires guiding public opinion in the right direction, empower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respecting diverse choices. By doing so, we can consolidate a correct and shared value consensus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regarding education and the issue of educational equity. This will enhance social trust in the fair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contributing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favorable mindset.

Keywords: education fairness in the new era; social mentality support; value consensus; social trust; mindset

About the authors: YANG Yue, PhD in Education,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Researcher at Centre for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